



本书得到“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古典戏剧的文化翻译与传播”（编号：JD1326）
及“江西师范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古典戏剧英译的叙事研究”资助

A Study on Translators' Style of Peony Pavil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文化翻译视域下的 译者风格研究 ——《牡丹亭》英译个案研究

曹迎春◎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得到“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古典戏剧的文化翻译与传播”（编号：JD1326）
及“江西师范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古典戏剧英译的叙事研究”资助

A Study on Translators' Style of Peony Pavil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文化翻译视域下的 译者风格研究 ——《牡丹亭》英译个案研究

曹迎春◎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从文化翻译的视角下出发,厘定了文化翻译的内涵,探讨了译者在文化翻译中的各种角色,并建构译者文化翻译风格的批评模式。通过对《牡丹亭》许渊冲译本和白之(Cyril Birch)译本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研究,归纳了两位译者的文化翻译风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翻译视域下的译者风格研究:《牡丹亭》英译个案研究 /

曹迎春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313-16572-5

I. ①文… II. ①曹… III. ①《牡丹亭》-英语-翻译-研究

IV. ①I207.37②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 第 021694 号

文化翻译视域下的译者风格研究——《牡丹亭》英译个案研究

著 者:曹迎春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 版 人:郑益慧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15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2 月第 1 版

书 号:ISBN 978-7-313-16572-5/I

定 价:38.00 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10

印 次: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 读 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769-85252189

前 言

20 世纪 90 年代关于文化与翻译的讨论非常热烈,翻译的“文化转向”把研究者从文本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认识到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活动。翻译不仅仅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活动,还涉及社会、文化、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翻译研究的视角扩展到影响翻译活动的各种外围因素、翻译的过程以及译者行为研究等方面。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关键角色,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化翻译视角下尤为突出。在文化翻译视角下的译者大有作为,他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又独具特色的主体。

文化翻译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关注文化差异的同时又要注重跨文化之间的交流。首先,文化翻译是一种视角,从宏观的文化视角下考察翻译行为、翻译过程以及翻译的作用。文化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通过这种对话和交流促使不同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文化翻译是一种双赢,不管是强势文化,还是弱势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都能获益。其次,文化翻译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对待翻译的正确态度。对文化差异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推动多元文化的发展,并通过文化参与,促进多元文化的互补、互动,有利于克服文化民族主义,从而通过文化翻译促成世界多元文化格局。最后,文化翻译是具体的策略和方法,关注翻译文本中文化信息的传递是文化翻译参与文化建构的基石。有宏伟的文化建构蓝图,再通过具体的文化翻译策略逐步建构文化交流的桥梁。因此,文化翻译既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和目的论。在认识论的层面,关注文化和翻译的互动关系;在方法论层面,关注具体文化信息的表达;在目的论层面,文化翻译最终的目标是实现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各民族和谐共存的文化生态。

在宏观的文化翻译视角下,译者的作用得以突显。译者不只是简单的

文字转换者,他们具有多重角色。他们积极参与到翻译的文化交流中,他们是文化的阐释者、中介者和传播者。译者自己的视域在理解文本的过程中,能与作者对话,与原作者进行“视域融合”,并把自己阐释的原作者的意图展现在译文当中。译者处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中间,充当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中介者。译者作为中介,调节不同的文化,目的是寻求克服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不相容性的方法。译者更是不同文化的传播者,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文化之间,各国的译者自觉参与到文化的传播当中,使得不同文化得以沟通和交流,促进人类文化的进步和发展。译者是一个具有多重角色的个体,存在着个体差异。不同的译者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文本和不同的翻译目的会产生不同文化风格的译文,导致译文的多样性、译者个人的文化心理、文化修养以及翻译思想都会对译者的文化风格产生影响。正如“文如其人”,在文学翻译当中自然会出现“译如其人”,译者的文化风格也体现在其翻译作品当中。根据文体学的描述框架,笔者试图建构译者文化风格分析的模式,主要从语言文化信息层面、语篇文化信息层面和文化特色词层面三个模块对文本进行分析,同时结合译者个人的文化经历、文化修养和翻译思想综合考察不同译者的文化翻译风格。

本书对《牡丹亭》的英文译本进行个案研究,选取许渊冲译本和白之译本,借助“AntConc3.2”和“Text Preprocessing”文本分析软件对两个译本的语言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描述。语言文化特征主要是从音韵、潜台词、典故等方面的翻译探讨两者的区别。许氏注重音韵,对潜台词、典故的处理以意向为主,同时又兼顾陌生化的审美原则。白之则更注重语义,试图以字面对等的方式保留原文的文化特征。在戏曲文体方面,许氏注重戏曲作为特殊文体的特征,注重其上口性和表演性,兼具文学性的特征;白之则更注重文学性,但是上口性和表演性方面略有欠缺。

从文本分析中反映出许渊冲和白之两位译者整体的文化翻译风格:许渊冲注重交际效果,通过创造性和概括性的翻译使译文简洁易懂。大量口语化句式的表达,淡化文化的特色性,但在特殊文化词语的处理上适度陌生化,又保留恰当的异域性,突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和会通性,体现了许渊冲文化普遍性的文化价值观,以及积极融入世界文化的文化自觉。其译本适合普通大众读者阅读,从故事情节中了解原语文化,是普及古典戏剧文化

的较好文本。白之译本注重文化因素、译文的词语,句子结构相对复杂,并极力模仿原文的表达,试图充分地保留语义;并通过深度翻译方法,即通过注释、序、跋等副文本,向目的语读者介绍、解释中国文化,体现了白之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即充分认识文化的差异性并尊重不同的文化。白之译本是系统型、学术型的翻译模式,适合学者、文学、文化爱好者阅读。本文还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两位译者的文化翻译效果进行了考察,发现不同群体的读者对译文的体会不同,从总体上看,留学生读者偏向于许渊冲译本,中国学生读者大部分也偏向于许译本,学术型研究者的观点不一。由此可见,不同译文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这样才能满足不同层面的文化交流。这对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有所启示:经典的翻译应该充分考虑翻译的目的和面对的读者是谁,同时允许有多个译本,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目的的阅读。

曹迎春

2016年10月

目 录

第1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译者研究综述	3
1.3 研究内容	8
1.4 研究意义	9
1.5 研究方法	10
1.6 研究架构	11
第2章 文化翻译	14
2.1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14
2.2 文化翻译的内涵	17
2.3 文化翻译与文化阐释	20
2.4 文化翻译与文化传播	22
2.5 文化翻译与意识形态	23
2.6 本章小结	25
第3章 文化翻译视域下的译者	27
3.1 文化翻译视域下译者的角色	27
3.1.1 文化的阐释者	28
3.1.2 文化的中介者	29
3.1.3 文化的传播者	30
3.2 文化视域下译者文化风格形成的因素	31

3.2.1 文化势态	31
3.2.2 译者的文化心理	33
3.2.3 译者的翻译思想	40
3.3 译者文化风格	46
3.3.1 译者风格	47
3.3.2 译者风格分析模式	50
3.3.3 译者文化风格分析模式	51
3.4 本章小结	53
 第4章 以《牡丹亭》英译为例的译者文化翻译风格研究	54
4.1 《牡丹亭》简介	54
4.1.1 《牡丹亭》的译介	55
4.1.2 海外舞台上的《牡丹亭》	56
4.1.3 《牡丹亭》英译研究	60
4.2 《牡丹亭》英译语言标记研究	63
4.2.1 语音分析	63
4.2.2 词汇分析	72
4.2.3 句子分析	82
4.3 语篇标记分析	87
4.3.1 修辞分析	88
4.3.2 叙事风格分析	94
4.3.3 文体形式分析	99
4.4 文化特色词分析	100
4.4.1 典故	101
4.4.2 专有名词	103
4.5 本章小结	106
 第5章 许渊冲、白之文化翻译风格对比研究	107
5.1 语言层面: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	107
5.2 审美层面:文学性与上口性	113

5.3 文化层面:深度描写与浅度描写	116
5.4 文化价值观:文化相对论与文化通约性	121
5.5 译者文化翻译效果实证研究	122
5.6 对古典戏剧翻译的启示	124
 第 6 章 结语	 125
 附录 1	 127
附录 2	135
参考文献	138
索引	149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随着翻译研究范式的转换,翻译研究的对象也从以文本中心转向以文本外部环境及以译者为中心的译者研究和翻译过程研究。尤其是对译者的研究成为当前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外学者都非常关注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如法国的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在《翻译批评论:约翰·唐》一书中指出翻译批评必须以译者为主体作为基本出发点,并提出了“走向译者”的口号(查明建,田雨,2003:21)。各翻译流派也强调译者的作用,译者不再“隐形”。操纵学派认为文学翻译实质上是译者选择和摆布文本的过程。目的论者认为翻译是一种目的性行为,任何翻译都有一定的目的。由此,译者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总会按照自己对读者和译入语需要的理解去制定相应的翻译策略。生态翻译学派认为译者的适应性选择是翻译的关键。这些理论都强调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对翻译家的研究也成为翻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1995年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出版了《历史上的翻译家》一书,该书以翻译家为中心探讨了翻译家与民族语言发展、与民族文学的兴起、与知识的产生与传播、与权力控制、与宗教传播、与价值传播、历史形成等多方面的议题,从而窥视翻译家在人类文化发展和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同上)。我国也出版了类似介绍翻译家的著作,如由郑鲁南编的《一本书和一个世界:翻译家笔谈世界文学名著到中国》。该书从杨绛、草婴等翻译家的视角陈述了各自的翻译经历和翻译方法等。虽然该书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但是足以说明翻译家的地位和作用。许钧(2001)编写出版的《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以对话的形式探

讨了当代著名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国内的这几部翻译家研究著作虽然不够系统,但也体现了翻译家的文化作用。此外,在翻译史的研究领域也突出翻译家的作用,尤其是对近代翻译家如严复、林纾、胡适、鲁迅、林语堂、梁实秋、朱生豪、傅雷等的个案研究,凸显了译者在翻译中主体性和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些翻译家都在各自所处的时代翻译了大量的作品,影响了当时的文化发展。但这些大都是从外译汉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很少是关于汉对外翻译的译者研究。由于翻译方向不一样,译文所面对的接受者不同,以及汉语与其他语系,尤其是英语等字母文字体系的差异巨大,在汉译外的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体现和作用与外译汉有所不同。

当前,我国国家综合实力加强,提出“走出去”的文化战略。“十二五”期间提出“文化系统将继续构建以优秀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对外开放格局,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提升国家软实力。”在图书对外出版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对外出版计划,如《大中华文库》(英文本)已经出版了81种;“经典中国对外出版工程”经专家论证,第一批资助的书目就有113种;“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三年多来(2006—2009),已资助翻译出版21种外文、1380多种图书,资助金额超过4000万元;2009年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中国图书版权输出多达2417项,居历届之最。此外,还有“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金水桥计划”等不同规模的对外出版项目同时在实施。但是,“走出去”的效果如何呢?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表示,目前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严重“入超”,“文化赤字”很大,在世界上表现中国核心价值观和悠久历史的文化产品及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仍然有限。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第六次会议上(2010),多位资深专家疾呼:翻译“惨不忍睹”,文学社科类翻译“大家”难寻。他们指出外销书存在的毛病是:语言质量差,翻译生硬,简单的词汇堆砌,意思走样,甚至出现政治错误;翻译艺术水平不高,受中文思维框架的影响,多是给予字面上对应翻译,外国读者很难接受,达不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还有的直言:“这样的翻译,我自己看起来都觉得很别扭,更不要说让外国人看得懂了。”“走出去”遭遇的第一道坎就是翻译,没有好的翻译,我国优秀的文学文化资源就

不可能与世界交流^①。因此,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对中译外的译者研究更具时代性。本论文拟从文化翻译的视角对中译外译者的翻译风格进行研究,论文选取中国古典戏剧《牡丹亭》的两个英译本为语料进行对比分析,分别是中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和美国汉学家白之(Cyril Birch)的两个译本,探讨中外译者在翻译中的不同文化风格,形成这些风格的原因,以及对当前中译外跨文化交流的启示。

1.2 译者研究综述

译者研究一直是翻译理论家研究的重要内容,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研究范式中,对译者身份和地位的看法不一。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中,译者往往不受重视。译者常被喻为是“仆人”、“传声筒”、“应声虫”、“鹦鹉学舌”、“隐形人”等等,这些对译者的称呼反映了人们对译者的认识 and 态度。然而,也有不少理论家很早就开始注意到译者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古罗马翻译理论家贺拉斯曾提出译者应当是译文的“主宰”(刘宓庆,1995:104);英国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称译者为艺术之“天才”,是原语和译语的语言“大师”;德国文学家、译论家歌德(Johann Goethe)也认为译者是人民的“先知”(谭载喜,2000:131);中国古代也有人把翻译家比作“圣人”、“法师”(马祖毅,2001:39)。虽然他们没有对译者的地位展开系统的理论研究,但是这些形象的比喻已经表明了他们对译者在翻译中的主导作用的认识。“译者比喻”具有十分重要的译学价值,通过对这些比喻的分析和研究,可以认识译者的行为角色和身份特征(谭载喜,2011:116)。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翻译理论家们开始更加系统地从理论上关注译者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哈提姆与梅森合作的两部著作《语篇与译者》和《译者即交际者》。《语篇与译者》主要回顾了语言学对译者的影响,文章分别从语域、语用学、符号学、互文性及文本类型等角度论述了它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探讨了篇章结构与翻译语篇组织与翻译,以及译者的协调与纽带作

① 以上数据与观点引自“没有好翻译,别想顺畅‘走出去’”。http://www.tac-online.org.cn/ch/tran/2010-07/01/content_3587617.html

用等(Hatim & Mason, 1990: v - vii)。《译者即交际者》主要以语篇分析为理论基础,从语篇语言学角度的口译研究与同声传译的语篇、影视翻译中的礼貌问题、文学翻译中的语域成分、神圣敏感性语篇翻译中的形式与功能、跨文化交际、意识形态语篇层次的错误等等。在这两部著作中哈提姆与梅森认为译者作为“协调人”,能居于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间的动态交际过程之中心(Hatim & Mason, 1990: 223)。译者是交际信息直接的接收者和产生者(Hatim & Mason, 1997: 2)。这些论述体现了他们对译者重要性的认识,但是这两部著作都是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依然关注的是原文作者,以原文文本为中心。虽然在标题中都明确提到了译者,但是实际的研究中并没有系统论证译者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译者的行为,更没有提出以译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为核心的理论体系。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一书中,从对美国文学翻译的描述中探讨“归化”和“异化”的问题,认为归化使得译者的身份边缘化,从属于原作者,体现了英语国家文化帝国主义行为。因此,倡导以“异化”的策略来“对抗”,译者身份的显露可以使翻译成为一种对话。韦努蒂的观点为提高译者的地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他没有深入到译者行为的研究中去。

道格拉斯·罗宾逊(Robinson Douglas)的代表作《译者登场》把研究视角转向译者,在该书的前言中,作者对“The Translator's Turn”的含义做了以下解释:①解释为“译者的驾驭”,把翻译比作开车,译者是司机,掌握着方向盘,驶向目的地;②解释为“译者的转换”,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对译本进行各种转换,包括好或坏的转换、角色转换、自我推销、回归转换、颠覆或破坏性转换、误解转换、停留在原文的转换、变样的转换、跨文化对话等;③解释为“现在轮到翻译实践者了”,或“翻译的译者转向”,指翻译理论家不应空谈理论,应对翻译实践者多提供一些工具而不是规则;④解释为“翻译理论家转向”,指翻译理论家不应把自己看作牧师,而要把自己当作普通人,不要单是提出种种限制和规则(Robinson, 1991: x - xvi)。罗宾逊通过原文向译文的各种转换,突出了译者主导的地位。在其另一本著作《谁翻译?——理性之后的译者主体性》(Who Translates?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Beyond Reason)中,罗宾逊借用多个学科的理论,通过“翻译即

为通灵”这一比喻,对译者主体性的表现形式及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多种因素,作了探讨译者作用的二元论:译者要么是掌控的理性主体,要么只是传达他者声音的神秘通道,并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后理性主义译者主体性理论。

除了以上专著,国外不少翻译理论书籍也有章节涉及译者的素质或译者的作用等。如 Peter Newmark 在《论翻译》中提到译者的作用时认为:

They must be seen as a key figure in promoting better understanding among peoples and nations. They must not be regarded as anonymous.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all definitive, therefore written, bilingual and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s. They have the authority to mediate between parties, and they have their own responsibility to moral as well as factual truth... In other cases, where there is doubt or cultural bias, they should write a separate preface, explaining how they have treated the work, how they have interpreted any controversial key-terms and when appropriate, where and why their translation differs from the previous ones—a translated novel without a translator's preface ought to be a thing of the past, and therefore the preface as well as the work should draw the reviewer's attention. Thus the translator offers an insight into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as well as into other culture^①.(Newmark, 2006:41)

纽马克认为译者在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再是无名氏。译者应该协调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并可以在翻译中通过序言来说明对原文存在疑问或偏见的地方,这充分体现了译者在文化交流中的主体性地位。

国内关于译者的研究起步较晚,较缺乏关于译者研究的专著,但对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也有认识,如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位置的角度来说,一方面,在译界公认的翻译“原文——译者——译文”关系流程中,译者居中,地

① 引文大意:他们(译者)绝不是无名氏,在促进不同民族的交流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他们对各种形式的交际负责,有权协调交际双方,有责任忠于原语文化的精神与事实,对原文有疑虑和文化偏见的地方,应该撰写序言说明在翻译中是如何处理的。译者应该提供对原文语言及文化的看法。

处“中央”，是适应“原文”和选择“译文”的“中枢”。另一方面，在“作者——译者——读者”三元构成的权利话语结构上，地处“中间”的译者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连接点，可以主动调整其位置和功能，以适应作者和读者话语权利的关系。“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讲，译者控制着产生译文符号的整个操作过程”（袁莉，2000：399）。整个翻译过程的一举一动，无不由译者一手完成，他/她既是原发语篇的接受者又是目的语篇的创造者，处于核心地位。“翻译的‘好’与‘坏’全靠译者的‘思考’和‘感觉’”（Robinson，1991：12-13）。

此外，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论文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许钧提出“当我们定义翻译主体性的时候，我们显然要考虑到作者与读者的主体作用，但居于中心地位的则是译者这个主体”（2003：11）。袁莉认为“译者是这个阐释循环的中心，也是唯一的主体要素”（2002：406）。查明建、田雨认为“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也是民族文化建构的重要参与者”，并从翻译过程、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译作与原作和译入语文学的互文关系、译者与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间性关系这四个方面，分析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表现（2003：14）。胡庚申也提出“译者中心”的翻译观，并从译者功能、译品差异、意义建构、适应选择和翻译实践等角度加以论述（2004：10-16）。

以上国内外对译者的研究重点都在译者的地位，即其主体性上的研究上。在这方面，译界已基本达成共识。然而，“翻译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译者的情况而不是所译作品的情况”（Hermans，2000：12-13）。因此，对具体译者翻译风格的研究是译者研究方面的另一个有待继续开发的研究课题。国内已有不少关于具体译者的研究，比如对历史上著名的译者如严复、林纾、胡适、鲁迅、林语堂、梁实秋、朱生豪、傅雷等的个案研究。研究方法基本是定性的描述，通过对历史时期的分析和文本的分析阐述他们的翻译行为和翻译特点，这种研究方法相对主观。2000年，Mona Baker提出通过语料库的形式对译者的翻译进行分析，这丰富了对译者研究的方法，使译者风格研究在文本层面更具有科学性，更具有说服力。国内冯庆华教授也通过各种文本分析软件对《红楼梦》杨宪益、戴乃迭的英译本和霍克斯的英译本进行了语料对比，探讨了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研究和思维模式下的译文词汇研究，为译者风格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分析模式。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译者研究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已经得到认可，各

流派的翻译理论研究都对译者的主体性有自己的理解。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对译者的关注更为突出,但对译者在文化翻译视角下具体的作用 and 影响,译者文化翻译风格没有相关的系统研究。因此,本论文拟从文化翻译的视域下来探讨译者的具体身份和对译者风格产生影响的各种文化因素。此外,对译者风格的研究依然有拓展的空间,每个译者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她所处的时代不同、国别不同,就必然会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不同的文化气质、不同的文化心理等,其翻译的风格也就不一样。因此,每个翻译家都值得我们研究。

在译者个案研究方面,对许渊冲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直是个热点。作者以“许渊冲”为主题,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搜索(CNKI),有785篇相关的论文,根据学位论文搜索有183篇硕士论文、2篇博士论文^①:朱明海《许渊冲翻译研究——翻译审美批评视角》(2008)和王厚平《美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艺术研究——许渊冲翻译理论与实践》(2010);另有专著两本《许渊冲与翻译艺术》(张智中,2006)和《从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马红军,2006)。以上期刊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对许渊冲的研究多数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对许渊冲的诗歌翻译“三美”理论的讨论或者是对其诗歌翻译的赏评;②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出发讨论许渊冲的翻译实践;③从美学角度评论许渊冲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张智中(2006)的专著《许渊冲与翻译艺术》主要叙述了许渊冲的生平,梳理了许氏从求学到工作直至晚年译书的全过程,简述了许氏文学翻译理论,对许译的古诗和小说分别做了实例分析:古诗分析以语言学方法阐释了许氏古诗英译艺术、语言风格、诗词改译、形韵意等方面的特点;小说汉译分析则以《红与黑》的汉译本与英译本进行对比来论证许氏小说的汉译风格和策略。马红军(2006)的研究,将许渊冲的翻译观置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对其价值、地位与作用进行评断;进一步认识韵体诗(中诗英译)的利弊,并通过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对许氏翻译作品反应的问卷调查,以期对国内中诗外译主导策略提供必要的理论及实践参照;在关照西方读者审美情趣与期待视野的基础上,探究多维度译诗模式的可行性。朱明海从翻译审美批评

① 数据提取截至2012年5月。

角度对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进行评析,并以许译的《论语》和《西厢记》英译本为对象,对“许渊冲模式”这一翻译审美批评模式用于翻译批评实践展开讨论。作者最后得出了如下结论:“许氏译论阐发的‘三美’可以作为翻译审美批评标准。作为潜在的翻译审美批评的共识真理,许氏译论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朱明海(2008)的创新点在于提出了“许渊冲模式”的翻译批评模式这一新概念,其核心内涵是许氏的“三美”。王厚平(2010)以美学视角从译者主体性、阐释学、文化翻译等不同侧面对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进行探讨分析后得出了如下结论: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是在吸纳了中国传统美学,尤其是文艺美学,适度借鉴了国外美学合理要素的基础上,与经由他扬弃和发展的中国传统译论和创造性翻译思维相结合的产物;他认为,从美学视角考察其翻译实践,许渊冲作为审美主体在其文学翻译中充分发挥了主体能动性,对审美客体(原文本)进行了创造性翻译,再现了文学文本内在的美感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的转化,从而能较好地服务于传播中华文化的翻译目的。以上四部著作对许渊冲的研究各有特色,张智中系统地梳理了许的生平,从语言学角度对其实践进行分析;马红军通过实证研究探讨许译诗歌翻译的可行性;朱明海从审美接受角度探讨,并提出“许渊冲模式”;王厚平从美学角度及译者作为审美主体的角度,综合评析了许氏译论及实践。这些研究为理解许氏译论和评价其翻译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进一步对许渊冲的研究提供了参考。本书拟以《牡丹亭》的英译本为例,对中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和美国汉学家白之的文化翻译风格进行个案研究,探讨各自的文化翻译特点及其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

1.3 研究内容

基于以上对译者研究方面的综述,以往的译者研究基本上从译者主体性出发,以文本为中心展开的;本文拟从文化翻译视角论述译者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具体身份和地位,以及译者文化风格形成的影响因素。结合《牡丹亭》英译的两个译者许渊冲和白之的译文文本进行分析,探讨这两位译者的文化翻译风格。本书具体的研究内容如下:

首先,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厘定什么是文化翻译?文化翻译的性质、作